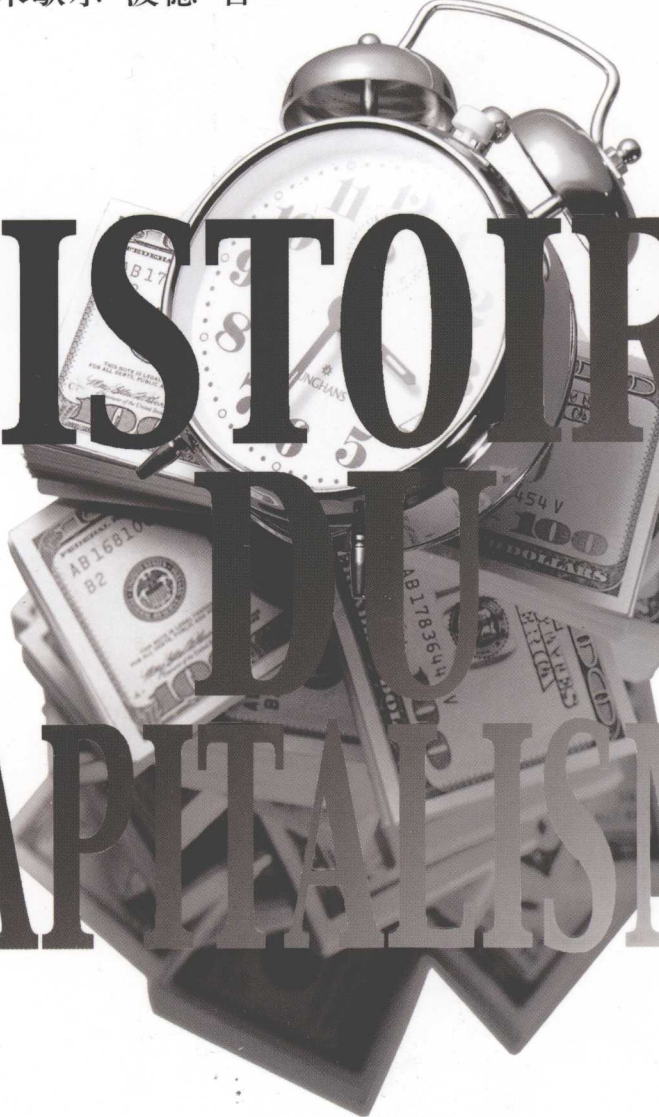


〔法〕米歇尔·波德 著



HISTOIRE DU CAPITALISME

郑方磊 任轶 译

资本主义的历史

从1500年至2010年

〔法〕米歇尔·波德 著



郑方磊 任轶 译

资本主义的历史

从1500年至2010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法)波德(Beaud, M.)著；
郑方磊，任轶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2
(辞海译丛)

ISBN 978-7-5326-3552-8

I. ①资… II. ①波… ②郑… ③任… III. ①资本主义
经济—经济史—世界 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580 号

总策划 彭卫国 潘涛

责任编辑 吴雅仙

装帧设计 姜明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

[法]米歇尔·波德 著

郑方磊 任轶 译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网 址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100册

ISBN 978-7-5326-3552-8/K·841

图 字 09-2009-052号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联系电话：021-66511611

《辞海译丛》缘起

《辞海》自 1936 年初版以来，风行宇内，历久弥新。本社有幸，负《辞海》修订出版之责，于“十年大修”外，近年亦颇致力于《辞海》品牌之延伸，《辞海译丛》应运而生焉。《译丛》旨在遴选域外学术著作之适于大众阅读者，移译为中文，俾国人快捷获取新知。选目原则有二：一为冶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既广见闻，更启深思；二为融学术性与普及性为一体，既具高度，复饶趣味。

《译丛》自 2011 年起陆续推出。初期选目以科学人文类译著为主，今后将尽力拓宽领域，向读者奉献更多佳作。寄望各界博雅君子，以爱护《辞海》之心，垂注《译丛》，助我教我，共育此书苑新葩。

上海辞书出版社谨识

2011 年 6 月

资本主义的历史

作者简介 **米歇尔·波德**(*Michel Beaud*, 1935—)

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法国国家经济学博士。他的经济学观点中融入了历史、资源配置、发展差异、环境等诸多因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从资本主义概念、再生产矛盾、世界格局等角度来分析全球正在经历的变革。到目前为止,他已独立撰写了《经受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1800—1981》(1982年)等十七本关于政治经济和世界发展的著作,其中多本再版多次,并被译为多种语言。

献给卡利俄佩(Calliope)

致谢

感谢巴黎第八大学经济政治学教研单位*的师生们,他们从各自领域所作的研究、提问和批评促使本人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进行思考。

同样需要感谢经济学与统计学资料室主任玛格丽特·勒布兰(Marguerite Leblanc)、巴黎八大图书馆馆长玛德琳·朱利恩(Madeleine Julien)及其助手和同事,帮助我查询和收集了必要的文献资料。感谢帕特里克·阿拉尔(Patrick Allard)、德尼斯·巴贝耶(Denise Barbeyer)、热罗姆·布拉森(Jérôme Brassens)、伯纳德特·杜维尔内(Bernadette Duvernay),他们阅读了此书的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感谢塞伊出版社的编辑们,尤其是埃德蒙·布兰(Edmond Blanc),

* UER, Unité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的缩写,意为“教育与研究单位”,其建制与功能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或其他国家大学的系或所。在此简称“教研单位”。——译者

他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及《经受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的编写纳入出版计划,从而使我有勇气完成这两本书。最后还要感谢为此书完成打印输入的克里斯汀·马法尔(Christine Mafart)和版式设计的克里斯提安·班瑟(Christian Bansse),以及所有对此书的问世和发行有所贡献的人们。

还要感谢的有,雅克·热内茹(Jacque Génèreux)为最后两版所做的工作,以及芭芭拉·勒·戈夫(Barbara Le Goff)和曼纽埃勒·法耶(Manuelle Faye)为第五版所做的工作,塞西尔·韦德考(Cécile Videcoq)为第六版所做的工作。

米歇尔·波德

中文版序

此中译本于我而言是一大荣幸。

本书第一版面世于 1981 年,该版曾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组织翻译,并于 1986 年出版,名为《资本主义史,1500—1980》,所依据的底本是美国的英译本(Monthly Review Press,1983)。

因此,目前这个新译本是首次将我的这个作品直接从法文翻译为中文,而且使用的是新出版的第六版《资本主义的历史,从 1500 年至 2010 年》,相比于第一版而言有显著的增补,包含了最近三十年以来的重大变化。

我要特别感谢巴黎第七大学历史学博士郑方磊先生及其合作者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发展社会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师任轶小姐;还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潘涛先生,并感谢此中译本的责任编辑吴雅仙女士。

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增长、危机和变化——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社会、国家和世界的转变——将成为本世纪前三分之一部分的深刻烙印,因此我们有必要花时间思考正在发生于我们的事情:我们人类,作为有记忆力的生命,具备判断和决定能力的生命,拥有知识、行动、变化和破坏的有力手段的生命,从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更何况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息。

经济危机和经济增长,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在引起世界剧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曾经主要是“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北美、西欧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事情,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最强有力的增长主要发生在“新兴国家”,尤其是大陆国家和亚洲的大国。因此说,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些新的经济 and 金融力量崛起的时候,之前的强国则似乎受困于旧的生产和技术结构——它们的金融机构自那时起更多地通过投机和捕掠,而不是利用未来的革新和创造来致富。

因此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

同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环境所受到的影响正在扩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开采、破坏和废弃,是地球及其活力(或言,有活力的地球)的再生所不堪负担的;而且,自新千年开始以来,这些非常疏于管理的破坏进一步加剧,涉及耕地、可饮用软水、森林、渔业、物种、气候、臭氧和海洋。一些使我们的星球得以丰富多彩、美丽独特的重要而脆弱的平衡正处于危险之中*。

自古以来首次,一部分人类的消费和活动将整个地球置于危险境地,同时有几亿甚至几十亿人还处于无土地、无资源的困境:超过十亿人离乡背井,挤在城市贫民区里;超过十亿人得不到可饮用水,还有同样多的

* 见本人新书《面临最糟糕的世界(*Face au pire des mondes*)》,Seuil,2011 年。

人缺乏食物、营养不良。

此外,我们正被卷入一个新的、比此前几次都更加强劲的“工业革命”,因为它与科学的变化相联系,它越来越被超大型公司的选择和策略所主导。科技进展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回应当代的严重紧急状况:保障地球的生命力、保障人类整体都拥有合适的生活条件,反而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为拥有购买力的阶层、阶级和机构创造和构建一些新的商品。

总而言之,如同我在十五年前所作的诊断*,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决定性的时期,处于世界的真正“剧变”之中,而根据所采取的决定,我们将走向更坏或者更好。

自从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并且在下一个十年里我们还将会遇到一些;我们正在面临一些工业和城市污染,面临一些能源事故,面临一些重要资源的枯竭、面临星球(气候、臭氧层、海洋)所受到的一些威胁、面临一些饥饿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显然应该对上述每一种情况都进行研究并给出适当的解答。但在研究和解答之时,应清醒地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21世纪正将产生于其中。

人类正面临一些重要的抉择,如对于寻求永无止境且不断更新消费的社会模式,我们是否任由其扩大?在目前已有10亿到15亿消费者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毁坏,同时导致了许多不满。难道不应该致力于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使其基于适度、节俭,基于无破坏性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吗?而穷国、新兴国家、老牌富国,难道不应该在这一探索中共同合作,开始为新的人类社会打下基础么?

因为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全球策略上的非常重大的选择。几千年来,

*《世界剧变(*Le Basculement du monde*)》,La Découverte,1997年;第二版,2000年(及其韩文译本和日文译本)。

人类历史上刻满了抢掠、战争、征服、帝国以及其他一些支配体系的烙印。随着这个被破坏的地球人口达到 70 亿至 90 亿人,随着基本资源(土地、水……)的减少,冲突源将会倍增、加剧;而且基于 20 世纪下半叶核威慑的“处方”,很难说能够继续保障和平。难道不应该积极地发起行动,以图在业已全球化的世界里重新奠定一个和平,将其建立于合作的、跨地区的、国际的、跨大陆的部署之上吗?

难道现在不正是该奋起雄心,积极主动的时刻么?

大国和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世界各大地区和主要历史文明的代表们,宣布我们的地球处于危险之中吧!对于地球生物所面临的威胁、对于资源匮乏的人口所面临的威胁,采取措施吧!邀请所有国家、所有科学家和拥有其他各种知识的人们,所有公司和生产者全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起致力于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加人道的世界打下基础——简而言之,邀请全人类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奠定基础吧!

米歇尔·波德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于波瓦尔

译者序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译序,因为它并不包含译者对于所译书籍内容的介绍,更未谈及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主要是为了简要说明翻译时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手段和选择。之所以如此,首先当然是因为译者自身学养有限而不敢为之,不过也由于译者认为:此译本所含原书作者米歇尔·波德的初版及第五版导言以及他为我们的译本所专撰的中译本序言,已经详细地介绍了此书的撰写目的和内容,当然也蕴含着他对此书学术和社会价值的期待,因此,如果我们不自量力地在书前说教,那么既对作者有失尊重,也是对读者智慧的轻视。

然而,千万不要误解——我们的这一立场完全不是为了批驳二十五年前为此书初版的中译本作序的前辈先贤。作为此书第六版比之第一版所增补的近三十年来的“重大变化”中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所能够获得的知识和思想,因此我们要强调

的是：吴大琨为第一版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以及该版译者的序言，在当时而言是非常有用的，它们当然构成了我们如今的第六版译本不再需要作类似序言的最早的基础之一。对于其中所表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观点以及当时正文翻译所采取的一些处理，也应如是观之。更何况当时的译者只能从英译本转译，一些与法文原书不符之处也未必尽是中译者之过。正是这样看问题，我们才有勇气不惮被更有学识的专业人士和后人们所诟病，而接受了这一工作。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郑方磊和任轶二人合作完成，但不同于常见的各自承担某些章节的分工方式，全书所有文字都是二人随文讨论共同完成的。采取这一合作方式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全书译文风格的一致性。译文倾向于尽可能地保持原语言的结构和用词，因为我们觉得对于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信”所占的权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当然“达”也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雅”而言，尽管法文原书的遣词用句非常典雅，但译成中文时，除非是艺术地再创造（这就不免时常地偏离原意），要在译文中一一再现其典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持其知识上和逻辑上的准确，是我们翻译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

也许是由于我们过于固执于这一点，交予出版社的译文，存在诸多诘屈聱牙的文句——其中一些细思量之，的确是非得对照着法文原文，才能明白其中的结构和意思。对于这些文句，编辑作了一定的调整，使其更加通顺。我们非常感谢编辑的好意，因为，如果译文不在对照原文的情况下就不能为读者所理解，那么翻译就失去了意义。这时不得不部分地牺牲准确性，而这样的工作本应由译者自己来完成。个别情况下也有译文因此受到“误伤”，译者对于在阅读校样时已经发现的个例，已经向出版社提供了修正意见，至于万一的疏漏，当然属于译者的责任。

以下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说明。

首先是译者决定的部分。原书引文众多，其原文源自各种语言，但绝

大多数都引自法译本。本着尽可能接近原书读者所读到的内容的想法,对这些引文,都从原书作者使用的法译文直接翻译(唯一的例外是一首译自英文的诗歌),而不采用所对应的源语言文字作为底本。对于一些已有中译本的段落,我们偶尔参考了个别经典作品的技术处理,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是直接从我们所见的原书法文引文翻译。对于书名的翻译,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正文和原书注释中所列举书名,都尽可能使译名既贴合原书名,又切合所涉内容;另一种是作者在书末所开列的参考文献目录,仅根据字面意思翻译。最后我们对于一些认为需要说明的地方,作了一些译者注释。

其次是出版社决定的部分。由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对于此书所属译丛所采用的统一格式,译本的排版与原书排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原书每页连续脚注,译本调整为每章连续的尾注。对于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一般情况下正文中仅有中译名而不括注原名,并在书末提供译名表——这一工作由编辑完成。对于一些现实中存在数种译名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译者原先有一定的选择标准,但最后成书时是由编辑最终选定的。另外,编者也添加了一些编者注释。

最后,要特别感谢艾迪·恩格尔(Eddie Engel)先生和伊丽莎白·波尼弗伊(Elisabeth Bonnefoy)女士向我们解释了一些较为古典的引文的写作背景和涵义,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教授对我们讲解了许多经济学术语的确切概念,本书作者米歇尔·波德教授亲自回答了最后的一些疑难,并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潘涛博士对我们的信任,以及责任编辑吴雅仙女士对于此书的出版所做热心而又细致的工作。

郑方磊 任 轶

2011年11月1日

于塞纳河畔伊夫里/上海

前言

我于 1968 年起执教于巴黎第八大学,此书结稿时正值八大的文森校区依政府指令全部拆除。十二年间,校园内师生们的各种学术争鸣与工作使我受益良多。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学教研单位众多师生对此书的贡献,在此难以一一历数;其次,得益于其他领域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或地缘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们的观点;最后,还得益于集体讨论和思考,尤其是 1975 年关于大萧条的研讨会、1978 年关于法兰西与第三世界的研讨会,以及 1979 年关于“欧美内部新秩序”的研讨会。

回想在文森校区的岁月,我要提及两位已故者:尼考斯·泡兰察斯(Nikos Poulantzas),他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社会阶层、国家、